

长沙历史文化丛书

郑佳明 主编

# 长沙经贸史记



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课题



陈先枢 黄启昌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历史文化丛书**  
**长沙经贸史记**

陈先枢 黄启昌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002号

郑佳明 主编

长沙历史文化丛书

**长沙经贸史记**

陈先枢 黄启昌著

责任编辑:邓映如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望城县印刷厂印刷

\*

1997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

字数:202,000 印数:1—5,000

简易精装: ISBN7-5404-1679-3  
I·1342 定价:15.1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望城县湘江东路251号 邮编:410200)

# 《长沙历史文化丛书》前言

郑　佳　明

## (一)

长沙是我国首批公布的 24 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在长沙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20—15 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原始先民生息繁衍。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更引人瞩目,长沙南圫大塘遗址就是湘中地区相近于大溪新石器文化的代表,距今约 7100 年。长沙腰塘遗址和浏阳樟树潭遗址则分别是 5000 年前屈家岭文化和 4500 年前长江中游龙山文化的典型,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器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长沙出土的商周青铜器,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纹饰之精,居我国南方之首,其中四羊方尊和人面方鼎堪称国宝。宁乡出土的商代乐器大铜铙比湖北出土的曾侯乙编钟还要早 1000 余年,11 件铜铙组合起来,至今还能演奏出清脆的乐曲。

长沙有文字可考的历史有 3000 多年之久。长沙之名最早见

于《逸周书·王会篇》，该书所载上献周王的贡品中就有“长沙鳖”的名目。长沙名称的由来有多种传说。有人说古人按星宿分野，与轸宿“长沙星”对应的这片地方就叫长沙，故长沙又称“星沙”。还有“万里沙祠”、“沙长如米”、“长沙洲”、“祭祀女神之地”等说法。“长沙”作为治所，亦有别名，汉称“临湘”，晋称“湘州”，唐称“潭州”等。长沙又有“湘城”之雅称，清代陈运溶曾撰《湘城访古录》和《湘城遗事记》以记其事。在尧帝之前，长沙为扬越之地，属古三苗国。黄帝“南至于江，登熊湘”，把熊湘封给他的儿子少昊，熊湘即为长沙。炎帝教耕，“崩葬于长沙”，舜帝南巡，“葬在长沙零陵界中”。禹分九州，长沙在荆州境内，至今岳麓山还留有禹碑、禹迹蹊等胜迹。春秋时期长沙纳入楚国版图，战国时已建有城邑，为楚南重镇。秦王扫六合，在全国立 36 郡，长沙郡名列其内。自此，长沙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划的治所存世，历代相传。西汉封长沙国，都城为临湘。东汉复置长沙郡，三国时长沙属吴国。两晋南朝置湘州。隋唐两代曾为潭州，唐代中期又为湖南道治所。五代十国时，楚踞湖南，以长沙府为国都。宋代潭州是荆湖南路的治所。元朝先后改称潭州路、天临路。明清两朝长沙府辖 12 州县。1664 年（清康熙三年），两湖分藩，长沙即为湖南省治，1922 年（民国 11 年）定为湖南省会，1933 年正式设市。今天的长沙市辖芙蓉、天心、岳麓、开福、雨花 5 区，长沙、望城、宁乡 3 县和浏阳市，总面积 11825 平方公里，人口 563 万，市区面积 554.07 平方公里，人口 151.49 万。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长沙自秦汉以来就是湖湘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中心，历史辉煌、文化灿烂、名贤荟萃，人才辈出。清人卞宝第说：“（湖南之地）演迤延属，周袤三千余里，城邑屯戍以百计，绮交棋布，错若犬牙，而以长沙一郡为抚治，卫内则资平衡、宝、岳、常，捍外则特乎辰、沅、永、靖，（长沙）居中控

驭，远驾不劳，斯亦形势之全胜也。”在 11825 平方公里的的大地上，古城遗址、名人故居、古代墓葬、庙宇古迹、会馆书院、伟人行踪，随处可见。自 50 年代至今，已发掘春秋战国古墓 3000 余座，汉墓 10000 余座，保护完好的出土文物近 10 万件，全市现有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7 处，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5 处。马王堆和咸嘉湖等地出土的西汉文物以及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孙吴纪年简牍举世闻名，旧城区则是长沙主要历史文化遗存所在，郊县还有星罗棋布的近代历史遗迹和文物景点。

## (二)

长沙历史文化的内容是极为广泛的，经受历史的陶洗和筛选之后所留下的优秀部分是长沙人民的宝贵遗产，它能激发新一代长沙人的生存、创造和进取。弘扬优秀的历史文化，可以催人奋进，可以树立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爱乡的思想感情，增强民族团结，推动社会进步。爱国与爱乡是相辅相成的，爱国首先要爱乡，爱乡又能更加激发爱国。因此，对长沙历史的再认识是长沙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的原动力之一。把历史形成的共同的文化心理、地方文化个性提炼出来，更加精心地培育，便可形成城市和地区更强的凝聚力。传统文化是与历史同步形成的，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不能简单照搬，要批判地继承。

其一，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精神要认真加以弘扬。从长沙历史文化中折射出来的一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人文精神，集中体现了长沙先贤对于忧乐和生死这两个重要问题的态度。忧国、忧君、忧民、先忧后乐的忧患意识在长沙历史文化中反映相当突出。长沙作为屈原、贾谊的“伤心”之地，湘楚文化从一

初始就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屈原的《离骚》，其篇名就含有“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求绳墨与规矩于正道，宁死也不苟合求容。屈原怀沙自沉百余年后，又一位政治家兼文学家贾谊贬谪长沙。他上《治安疏》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其忧国之心，不在屈原之下。他在长沙写下了汉赋名篇《吊屈原赋》，以屈原的遭遇自比，抒发胸中的愤懑。自屈贾之后，忧患意识一直是长沙历史文化的主流。东汉末，“天下起兵诛董卓”，是“长沙子弟最先来”；在近代清政府起兵收复新疆的伟大战争中，又是“湖湘子弟满天山”。统率湖湘子弟，“舆榇出关”的就是 69 岁高龄的左宗棠。他还是在 20 多岁，穷困居家时就写过一副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敢为人先”的雄心壮志已溢于纸上。自湘军崛起之后，中国历次政治风云，湖南便成了领头的省份。戊戌维新期间，湖南是全国唯一忠实推行新政的省份；辛亥武昌首义，长沙率先响应；工农武装的红色割据也自长沙的秋收暴动而始。这都是长沙“敢为人先”的极好写照。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决定中国政治命运的关键时刻，对待生与死的抉择，长沙先贤更是大义凛然，慷慨悲歌。南宋末，元朝数万大军围攻长沙，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李芾率全城军民死守 3 月，直到矢尽粮绝。城破时，李芾全家 19 口从容自尽。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数百学子，与元军展开了搏杀，大部分献出了生命。清兵入关，明朝覆亡，时任明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的吴道行，悲愤不已，痛不欲生，他“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山中，不食而卒”，以身殉国殉君。近代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以鲜血和生命实现了维新图强的誓言。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不昌也。有之，请自

嗣同始。”临刑之前，他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长沙历代贤哲倡导的这种“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养心、治身、经邦、济世的道德规范，仍可作为今日长沙人的行为准则。1995年，长沙市民以投票的方式确定“心忧天下，敢为人先”为长沙精神的概括警语，说明长沙历代爱国贤哲所持的忧乐观和生死观已获得大多数市民的认同。

其二，对长沙历史文化要认真寻找其合理内核，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作较为深入的学术探讨。我们要看到历史文化、传统道德的矛盾性和双重性。就拿长沙历史文化来说，在社会风气方面，既有创新适变的一面、又有消极保守的一面；在风俗民情方面既有健康清新的一面，又有愚昧迷信的一面；在开放意识方面，既有汉唐主动开放、兼容并包的雄心大度，又有明清盲目排外，妄自尊大的闭锁意识；在哲学思想方面既有湖湘学派“知行并发”的重实践之风，又有阳明学派在长沙鼓吹的“知行合一”的唯心主义知行观；在近代人物方面，既有策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又有封建文化和帝制的忠实捍卫者。因而，我们要在弘扬传统历史文化时，要在继承和扬弃两方面下功夫，把着眼点放在综合创新上来。以前面说过的“忧君”为例，它是封建社会的重要道德标准，其核心是“忠”。因而我们对其“忠”就应来一番改造，剔除忠君思想和愚忠意识，而赋予忠于职守，忠于党、忠于人民和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等新含义。这样，“忠”照样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公民的道德准则之一。就长沙历史文化而言，讲入世、任人力、重教育、倡礼仪和重视人与社会关系等优良传统必须发扬，而封闭守旧观念、小农经济思想和忽视自然科学等弱点的消极影响不可不引起人们的警惕。虽然精华与糟粕共存，但注重经邦济世仍是长沙历史文化的主流，岳麓书院的横匾“实事求是”便是见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曾寓居在岳麓书院主编《湘江

评论》的毛泽东，深受湖湘文化的沐浴，用马克思主义对“实事求是”进行了改造，以《实践论》等著作加以阐发，使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照耀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文以载道，史以鉴今。古城长沙在建设现代文明的历程中，仍要“敢为人先”，把历史文化研究与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在“常变”上做文章，在创新中构建有时代特色、有长沙个性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既要注意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整理、对比和鉴别，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并把它熔铸于现代文化之中；又要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吸收包括国外先进管理科学和先进科学技术在内的一切外来的优秀文化，研究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伦理道德和文化取向问题，为古城长沙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保证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更加健康地发展。

其三，要把长沙历史文化的优势转变为长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现实优势，运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在《各方面都要整顿》一文中谈到文艺方针时，曾强调“古为今用”和“推陈出新”。这一原则对于长沙历史文化的研 究和长沙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近年来，长沙市对历史文化名城的地位十分珍惜和重视，在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和开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把历史人文景点作为市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对岳麓山、岳麓书院、桔子洲、开福寺、密印寺、浏阳文庙、天心阁等风景名胜不断进行修缮改造，还恢复和重建了 47 个文化遗址和人文景观，初步形成了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风民俗相得益彰的大文化格局，文化产业获得空前发展，其收入已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 10% 以上。历史文化名城的各种优势为长沙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活力和动力。但是，长沙在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的同时，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与城

市开发建设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集中表现在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与旧城改造、城市发展、市政功能完善、经济建设等的矛盾。如何实现历史文化名城与现代化城市的对接,已成为长沙城市建设与发展中面临的新课题。要攻克这一难题,根本的原则就是用强烈的文化意识指导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并把这种意识贯穿到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全过程。我们应认真地总结历史,为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整体与局部的结合,从建设上把握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从高起点上把握城市功能与城市文化的结合,从社会发展上把握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结合,从发展战略上把握文化与经济的结合提供科学的历史依据。

中共湖南省委常委、长沙市委书记秦光荣同志提出长沙要“以文立市”。他认为城市的个性是通过这个城市的文化来体现的,一个城市的文化,是一个城市的根,是一个城市的灵魂。设计界有句名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也适合于城市的形象设计和功能定位。长沙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是长沙的一笔宝贵的人文资源和无形资产,是长沙借以升华历史文化名城形象,提高海内外知名度,开发新的旅游资源和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极好素材,同时也为长沙经济与文化的结合找到了一个最佳结合点。因此,我们要将历史文化名城的地理、文物、典籍、名人、名胜以及文化精神、文化传统等各种优势,渗透到商、工、农、运输、城建、服务等各行各业和生产、经营活动中去,以多角度、多形式、多层次、多侧面展示历史名城的人文精神风貌和文化特色,增强城市的文化含量,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形成大经济与大文化共生互动的新的经济增长格局,要利用历史文化名城的人文资源优势,开发新型的文化旅游事业和文化市场,以文生财,以文富民。

总之,我们编写这套丛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和继承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和建设历史文化名城,开发文化旅游产业,培育长沙人文精神,把历史文化的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优势。

### (三)

作为丛书的前言,有必要对全书的内容,亦即长沙历史文化中最精彩的部分作个提要。

政治方面,2000 多年来,长沙作为疆域广阔的西汉长沙国和五代马楚国的都城,作为湖南历代郡、州、道、路及行省的治所,是历代湖南地方军政长官的驻节之地。湖湘地区的政治中心,除了在唐朝后期、五代末年、清代初年由于特殊原因曾设于衡州、朗州和沅州之外,其余绝大部分时间都在长沙,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这一地位日益巩固,直到今天。自秦汉以来历史表明,长沙的治乱兴衰,事关全省大局,长沙治即全省安,长沙乱则全湘震。长沙为湖南重中之重,确为自古而然。因此,历代朝廷对长沙的治理与安定都颇为关注,尤重长沙之选。自汉以来即有孙坚、谢安、孙盛、陶侃、张邵、杨公则、褚遂良、李允则、李纲、张孝祥、真德秀、魏了翁、辛弃疾、江万里、文天祥、季本、赵申乔、潘宗洛、陈宝箴、黄遵宪、赵尔巽等历史名人,在长沙担任过大守、都尉、刺史、知州、都督、安抚使、提刑使、按察使、巡抚等要职,或为一代名将,或为当世名臣,或为一代循良,把长沙治理得井井有条。从清道光至民国初,长沙籍的尚书、总督、巡抚、都督多达 20 余人,遍布全国各地。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反袁护国、农民运动、抗日救亡,长沙都是最富生气的地区。长沙又是毛泽东、刘少奇、胡耀邦等革命领袖的故乡,他们早年在长沙的革命业绩光照千秋。

军事方面，长沙自古号称“湘岭要剧”，北控重湖，南倚五岭，东御章赣，西捍黔滇，是长江以南西部地区的军事重镇和重要战场。历代湖湘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驻节于此，同时也是中央王朝直辖军队如唐代府兵、宋代禁军、元朝蒙古军、明朝镇兵、清代绿营兵驻扎之所，关系全湘之安全。自汉唐以来，长沙就是著名的古战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2000多年来，樊哙、马援、黄忠、关羽、华皎、李靖、马殷、周行逢、慕容延钊、潘美、张浚、岳飞、韩世忠、兀术、李芾、何腾蛟等名将大帅曾在此挥兵鏖战，展开了一个个壮阔的场面。长沙又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必争之地或重要战场，晋代杜弢起义曾攻占长沙，威慑荆湘；唐末黄巢大军一度攻克长沙，震动全局；南宋时，钟相杨么义军和红巾军均把长沙作为主要征战地区；明末张献忠大西军攻克长沙雄据数月；李自成大顺军也曾在此联明抗清；近代太平天国战争中，太平军与清军在长沙展开了攻城与守城的殊死拼搏。在中国近代史中，湘军所向披靡，威振天下，有“无湘不成军”之誉。在抗日战争中，日军三攻长沙不下，更使长沙增添了英雄的光彩。

经济方面，商周时期长沙地区就有了较大规模的商品交换，并开始使用货币。“长沙，楚之粟也”。唐代每年都有大批税米运往京都，有“三秦之人待此而饱，三军之众待此而强”的美名，潭州集市出现了“市北肩舆每联袂，郭南抱瓮亦隐几”的盛况。长沙是中国——世界陶瓷之路的起点，晚唐长沙窑首创釉下彩工艺，产品远销10多个国家。五代时长沙茶叶贸易盛极一时。宋代出现了“长沙十万户，游女似京都”的繁华市景。元代潭州的油漆颜料广告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广告实物。明代长沙府提出“聚四方之财，供一方之利”的战略，耗巨资开河通商，蔚为壮观，长沙成为中国四大茶市之一。到清代长沙又成为中国四大米市之首，清末成为中国五大陶都之一。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八大菜系之

一的湘菜更为长沙商贸平添几分文化色彩。

科技方面，长沙古代的科技成就令人瞩目，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天文学专著，中国最早的地图、医学著作、钢剑、玻璃制品都出土在长沙。楚汉长沙的髹漆、制镜技术，唐代潭州的釉下彩瓷技术，宋代潭州的造船、造纸和制墨技术，以及明清长沙的纺织技术都十分先进。长沙数学上的成就在全国相当突出，元末贾亨著《算法全能集》是《永乐大典》所收 20 种算书之一；晚清丁取忠创长沙数学学派，所编《白芙堂算学丛书》集中国传统数学之精华，并收有外国数学著作，被国外列为近代东方科学大事。近代长沙的冶炼技术在全国居先进行列，清末长沙在国内第一次采用西法提炼纯锑，“成色在世界著名之英京廓克逊之前”；民国时期又是长沙第一次成功采用西式“横罐炼锌”法炼锌，打破了洋锌垄断中国市场的局面。

文化方面，长沙作为湖湘文化之都，素有“屈贾之乡，潇湘洙泗”之称。屈原、贾谊、李邕、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刘长卿、杜牧、李商隐、杜荀鹤、欧阳修、姜夔、范成大、杨万里、袁枚等古代文化巨匠都曾“一为迁客去长沙”，为古城留下了千古绝唱和传世碑刻。长沙又是宋明理学的发祥地之一，宋代胡安国、张栻、朱熹，明代王守仁、张元忭，清初王夫之等，无不把长沙作为他们治学的宝地。医圣张仲景任过长沙太守，药王孙思邈相传隐居浏阳，与长沙结下不解之缘。而长沙籍的史学家邓粲、欧阳玄、王先谦，书法家欧阳询、怀素，文学家齐己、李东阳、冯子振，画家易元吉、齐白石，经学家易祓、王闿运，戏剧家杨恩寿、欧阳予倩、田汉等，更为历史文化名城增添无限光耀。长沙又是近代经世致用学派的大本营，经世、爱国、务实、奋斗的人文精神，对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

教育方面，东汉第一任太守郅恽在长沙“崇教化，表异行”，

唐将马燧在长沙造藏修精舍，唐相裴休在长沙筑草堂授徒传业，都给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岳麓书院是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全盛时期有“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之誉，历千年不衰。北宋后期仿王安石“三舍法”，将岳麓书院与湘西书院、州学改革为“潭州三学”。元明长沙府县两级官学的完备和社学、义学的兴盛在全国独步一时。清康熙时，两湖分闱，长沙单独举行乡试，促进了湖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清前期长沙涌现了李文炤、王文清、罗典、欧阳厚均等一大批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湖南近代几个人才群体先后有贺长龄、贺熙龄、陶澍、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郭嵩焘、刘长佑，唐才常、沈荩、黄兴、陈天华、杨昌济等就读于岳麓书院或城南书院。晚清教育救国思潮在长沙此起彼伏，长沙时务学堂和浏阳“兰馆”是中国较早的新式学校。长沙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发展中国的师范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北有南开，南有明德”，长沙近代的基础教育更是有口皆碑。

城市建设方面，长沙古城的形成与建设也有许多特色。长沙城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大遗存，古今城址重合，古今城市中心重合，而且从战国一直延续至今的都市在中国屈指可数。长沙“陆有玉璞，水有珠胎”，岳麓为屏，湘江为带，水陆洲浮碧江心，浏阳河曲绕郊外，湖泊星布，岗峦交替，城廓错落其间，唐代就已形成山水城市的风格。汉代定王台、贾谊故居，唐五代的园林、寺庙，宋代的书院，明代的王府、城阁等古建筑都有自己的特色和风格。长沙虽经“文夕”大火劫难，但独具一格的古建筑、古园林、古寺庙、古城址、古街道、古驿道、古河道至今仍历历可见。

风物民俗方面，长沙丰富多采、饶有趣味的名胜典故、民间传说、民俗风情、风物特产、乡土文化、方言民谚、诗联轶话等也是脍炙人口，为名城增添了不少传奇色彩。

#### (四)

综合上述内容,丛书分为政治军事、经济贸易、文化、教育、城市建设、风物民俗 6 册。长沙古近代的科技成就分别反映在经贸、文化、教育和城建各分册之中。各册既独立成书,又互相连贯,除风物民俗分册外,大体依时间顺序,采取条块结合、纵横交错的复式结构,系统地叙述长沙从古代(章目划分依各分册而异)至 1949 年长沙和平解放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特色。有些延续至今的事物,对于解放后的发展情况及现状也作了简要的交待。各分册体例相同,风格相似;部分内容有所交叉,但记叙角度不同,史实口径一致。在对历史的评价方面,允许保留各书作者的观点,不强求一致。

本丛书在编撰体例和写作方法上兼顾可读性和学术性两个方面。它既不同于一般的通史和方志,也不同于纯粹的历史文学和历史故事。首先,它作为向长沙市民和青少年学生进行爱国、爱乡教育的普及读物,作为向海内外宣传长沙历史文化的系列资料,要求叙述生动感人,文字通俗流畅,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做到“信、达、雅”。因此,全书以篇目体例展开,一篇一个主题,中心明确,短小精悍,均以记述为主,有时略加阐释和评论,一般不作大段的论证和考证。其次,这套丛书作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立项课题,是第一本系统的长沙地方史专著,是今后编撰《长沙通史》的基础,要求史实确凿,结构严谨,论点正确,有一定的学术性和较强的史料性,力图从各个侧面对长沙历史进行客观的描述。为此,在撰写过程中我们广泛查阅和搜集了各种文献资料,包括正史、专志、地方志、乡土志、古人别集、日记、杂著、外人记述、古典历史地理名著以及各种文史资料 200 多

种；还充分参考和利用了近几十年来长沙地区的文物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将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有机结合起来，第一次把长沙历史系统化，梳理出基本的发展脉络和发展阶段，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在史料取舍方面，突破了以往古代以农民起义为主线、近代以革命史为纲的模式，而致力于发掘一切优秀的、健康的和可资利用的人文资源，力求揭示长沙从先秦至近代兴衰起伏的规律，得出中肯的、科学的结论。为了保持其历史著作的全面性和完整性，对长沙历史文化中的一些负面内容也作了客观的介绍。

本丛书补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如“樊哙征西粤，扎寨南湖港”、“欧阳修寓郡城，访长沙翰林学士胥偃，偃爱其文，妻以女”，王安石作《潭州新学诗并序》等。又如，六朝时期长沙地区战乱纷起，易主众多，建置变化频繁，过去的著述对其都含混不清，但在这次编撰丛书时却梳理得清清楚楚。丛书还对过去的结论或记载之误也一一予以订正，并伴随着许多经得起推敲的新见解。《长沙历史风云》第一次全面探索了长沙自春秋战国以来近3000年的历史，研究了长沙作为湖湘地区政治军事中心的形成过程。《长沙经贸史记》第一次提出“汉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重要据点也包括长沙地区”这一观点，全书围绕这一观点广征博引，资料之翔实为以往论及长沙古代经济的书刊所不及。《湖湘文化之都》第一次把古越文化、楚文化、楚汉文化、湘楚文化与宋代以后的湖湘文化作为一支脉络联系起来，初步摸索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传承关系。《湘城教育纪胜》把长沙教育之盛与人才之盛紧扣在一起，“东汉长沙教育与忠孝之士的培养”、“两湖分闱与长沙科举人才之盛”等篇目都是首次见于书端。《湘城沧桑之变》挖掘出大量考古资料和古代文献，推翻了长沙城邑建于西汉之说，把长沙建城时间提前了200多年。一直被认为是

“北津城”遗址的三汉矶土城遗址，根据本书作者的考证，应是建于战国时期的“三石戍”。《长沙风物大观》则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勾划了一部长沙民俗风情画卷，是长沙第一部有关民俗史的著作，对于长沙风物民俗的沿革、源流、特点和演变过程首次作了系统、完整的描述。

本丛书的撰写范围主要为现今长沙市所辖区域。但长沙作为治所，在历史上对于所属区域的辐射和吸引作用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历史上隶属长沙而现已划出的区域，如明清长沙府属12州县中的一些县，所出现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若与长沙有直接关联，我们也酌情述及。本书所用史料力求真实可靠。对于同一史事有不同记载者，择信者而从。为了使读者作深层次的探讨，给今人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每分册之后附有一篇带总结性质的学术研究文章，以供参考。为避免重复，本丛书未设人物专册，而在《长沙风物大观》之后附《长沙历史文化名人录》，以便查索。

本丛书在编撰过程中参阅了《湖南通史》、《湖南近现代史》、《湖南省志》、《湖南大辞典》、《湖南文史资料》、《岳麓书院史略》、《岳麓书院名人传》、《楚国经济史新论》、《荆楚文化》、《长沙文史》、《长沙老字号》、《长沙史志通讯》、《长沙市志》部分未刊稿，及一些研究报告和学术论文等，采用了大型画册《长沙》的部分图片。在此谨向这些著述的作者表示感谢。

历史学家刘泱泱、何光岳、郭汉民和经济思想史专家柳思维欣然担任《丛书》的特邀顾问，他们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对全部书稿进行了认真的审订和史实校正，从而使这套丛书更具史料性和权威性。在此也一并表示感谢。

《长沙历史文化丛书》的编著，虽使长沙历史人文资源的开发和长沙地方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但由于以